

“毕同毕异”

——《世界印章七千年》研读札记

陈道义 陈 哲

内容提要：近东考古实物证明，世界印章迄今已有7000余年历史。从四大文明古国到近现代，虽然各地印章的起源、形制与功用各有不同，但都有共性特质。仔细研读英国多米尼克·柯隆（Dominique Collon）编辑出版的《世界印章七千年》（《7000 Years of Seals》），可知“权威性”、“神圣性”、“装饰性”、“艺术性”是世界印章“毕同毕异”的主要特征。探究这些特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考察中国印以外的非汉字印章的形制、功用、构形特征与美学价值等，同时也促使我们对全球“印文化”了解更为广泛。

关键词：世界 印章 大同异

《庄子·天下篇》有关“同异”的命题曰：“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①意为世间万物都有共同性，也都有差异性，此即是大同。世界历史上的印章亦如此，从四大文明古国开始到近现代，虽然各地印章的起源、形制与功用各有不同，但都有共性特质。《世界印章七千年》（《7000 Years of Seals》，直译为《印的七千年》^②）一书便探讨了世界各历史时期以及各地区，尤其是古代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古埃及、古代中国以及古代欧洲、伊斯兰教地区的印章之同异，值得我们深入研读，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考察中国印以外的非汉字印章的形制、功用、构形特征与美学价值等，同时也促使我们对全球“印文化”有更为广泛的了解。

《世界印章七千年》（以下简称“《世界印》”）英文版（图1），是多米尼克·柯隆（Dominique Collon）编辑、由大英博物馆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有关世界印章研究的论文集。所收论文共12篇（每篇皆列参考书目数十种），系1992年6月29日至7月2日在大英博物馆西亚部举行的专题研讨会上宣读，题名分别为“古代近东印”、“古埃及印”、“印度河流域印”、“米诺斯与迈锡尼印”、“希腊印”、“罗马印”、“拜占庭印”、“（欧洲）中世纪印”、“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英国私印”、“伊斯兰教之前印度印”、“伊斯兰印”、“中国印”。其作者主要为来自英、法、德等国的大学教授或博物馆的专家学者，如牛津大学的John Boardman、巴黎大学的Jean—Claude Cheynet、伦敦大学的J.M. Rogers、海德堡大学的Lothar Wagner以及大英博物馆的T.G.H.

① （晋）郭象注，高时显、吴汝霖辑校《庄子》卷十，袖珍古书读本第四册，中华书局1911年版，第20页。

② 林乾良：《中西印文化概论》，《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James等。其中德国Lothar Wagner的文章题目是《Chinese Seals》（《中国印》）。2014年10月，笔者在欧洲访学时曾去过海德堡大学，意欲拜访这位教授，惜未遇，但在他们的图书馆看到他当年的博士论文《Die ganze Welt in einem Zoll. Ein Beitrag zur chineschen Siegelkunde》（The whole world within one inch. A contribution to the lore of Chinese seal）（《方寸世界：中国印学的贡献》，图2，德文版），可见他对中国印的研究兴趣和深度。西泠林乾良先生曾对《世界印》十分感兴趣，并在相关的印学研讨会上以中文对此书作了梳理与介绍；法国汉学家、西泠印社社员龙乐恒亦曾谈及此书内容之丰富。然而近十年却少有人问津，或许因为其英文版而难以卒读。今笔者不揣简陋，就研读此书有关世界印章之大同异作一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世界印》各篇分别从“印史”、“形制、印材与工艺”、“功用”、“神圣与首饰”等方面展开论述，体例较为统一。据主编Dominique Collon介绍：“本书收集的是经过编辑甚至局部改写过的论文。”^①这样的体例便于读者在“大同”的框架下认识和理解“小异”，最终达到“毕同毕异”。笔者仔细研读全书，认为世界印章至少有四“大同异”值得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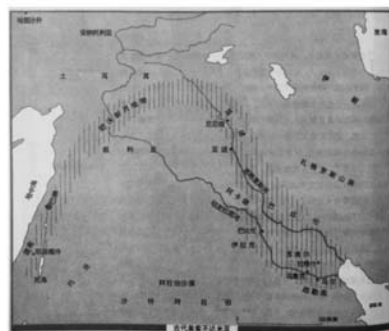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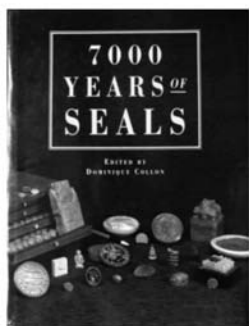


图1 《世界印章七千年》书影

图2 Lothar Wagner博士论文

图3 美索不达米亚地图

1. 权威性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印章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有新的发现。就其功用，首先体现的是“权威性”。如《世界印》第一篇章“古代近东印”介绍，目前发现最早的、距今7000年的安纳托利亚（即土耳其）及稍后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即叙利亚的东北部和伊拉克，图3），便有印记被发现用于交易（或储藏）的商品上以及与封口结扎线连接在一起的一片拉长的黏土上，以适应当时社会管理权威的需要，相当于后来中国的封泥。约在公元前4000年，类似的印记曾在安纳托利亚中部以及伊拉克北部出现，而且印记图形更加精美，有动物，有时也将动物与程式化的人物造型联系在一起（图4）。这些早期印章基本上可分为滚筒印和钤盖印两大类（图5，之后还有滚筒钤盖两用印）。滚筒印（Cylinder Seal）是圆柱形或圆筒形，通常用石材制成，圆周面有一圈凹雕的图形，圆柱上下纵向钻孔并装中轴把手以便灵活滚动，可以在大片黏土上加印，使受印载体留下二方连续图案式的印记（图6）；钤盖印（Stamp seal，含戒指印、垂饰印等），意同中国的“押捺印”，即以印面在受印载体上按压而留下印记，可以在小块黏土上加印，亦可以印面蘸上颜色（印泥）钤盖于相关载体之上。《世界印》第二篇章“古埃及印”阐述了“在（古埃及）早期的大墓

^① Dominique Collon: 《7000 Years of Seals》，British Museum Press, 1997, p.9.

中放置的许多大坛子的封口处都有带印记的封泥（图7），这些印记通常只有王国的名称或象征，后期又添加了财产的名称”。^①不仅表明了当时印章的“征信”作用，而且显示了它的权威性。另外，古埃及很早时文件就写在纸莎草纸上，而且重要文件要卷起来系上绳，并加盖印记。至法老时代末期，可能是受希腊传统的影响，他们将重要法律文件在一张纸莎草纸上写同样的两份，然后把第一份卷到文件顶部以印记封存，而第二份则公开以供参看（图8）。若有人对文件内容有争议（或因当时的墨水易消褪和涂改），可拆开第一份加以辨别，由此可见印记封存的权威性。其他如印度河流域、克里特和迈锡尼、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以及伊斯兰教地区和中世纪欧洲的行政及商业往来等，印记的权威性都有相似之处。如拜占庭，原则上，除了国王没有人可以把自己的图像刻在印章上；在17世纪的英国，只有地位显赫的印主人才可享有雕刻于最珍贵宝石上的戒指印（例如王子查尔斯的印）。正如大英博物馆古印陈列之说明文字所言：“掌控权力和商贸的人是有权威和财富的，他们佩戴印章以显示身份”（原文见图9）。只不过时代越往后印的功能则多样一些，如邮戳（图10）等。其实，中国印自秦始皇“天子独以印称玺”，到汉代印章制度（印材、印纽、印面尺寸等有严格规定）的等级森严等，都是印章“权威性”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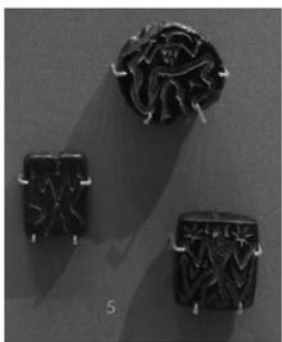


图4 合人物与动物造型印



图5 滚筒印与铃盖印



图6 滚筒印印记



图7 古埃及封泥及其印记摹本



图8 古埃及纸莎草纸书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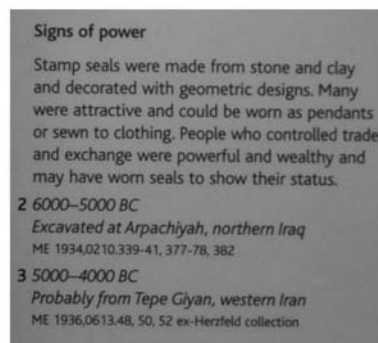


图9 大英博物馆古印陈列说明

^① Dominique Collon: 前揭书, p.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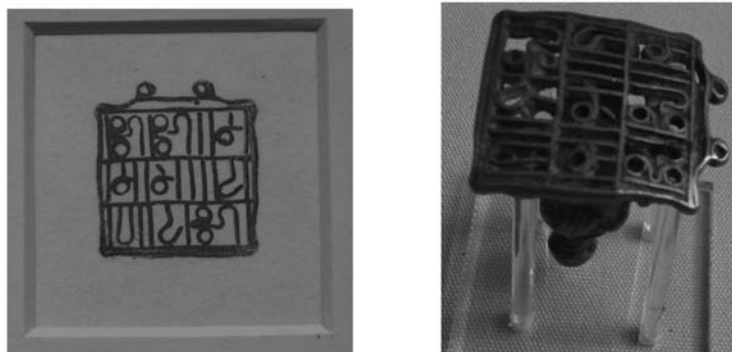


图10 17—18世纪邮戳印记及其实物

2. 神圣性

几千年来，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不仅有先后，而且常常是不平衡的，从七千年前的安纳托利亚文明，到两河流域文明（古代苏美尔、阿卡德、古巴比伦、亚述等）与古埃及文明，再到古希腊、古罗马与波斯文明，以及中世纪文明和近代工业文明等，都是如此。然而这些不同文明的共性特点是各自对神的敬仰与崇拜，尤其是早期的蒙昧时代。公元前二千多年苏美尔时代残存至今的楔形文字泥版书就用古老的证据表明当时人们的神灵观念演变过程。其中一个重要转变是，把神想象为全知全能的统治者，认为“神”是恢复精力的那种力量，指望“神”能带来丰足收成并能逃避自然灾害。由此，更进一步导向神性超然一体和神灵万能的观念，如“所有的古巴比伦人都承认神灵对人类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①。随着人们对诸神之信仰的不断发展，各种威严崇高的神庙建筑也欣欣向荣，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层的人们都在祈求终身受到神灵的庇护。而古代印章在其使用的过程中，可以说一开始就与神圣的护身符联系在一起，表现了使用者对印章如神一般的敬畏，因为它在封缄物件和文书而显示权威性的同时，也具备神圣的一面。据《世界印》第一篇章叙述，公元前4000年的末期，出现了大量用彩色石灰岩做的护身符印（图11，印面的图案一般为一组钻孔或几何图形），而且本章作者认为：“印章的角色从保护财产延伸到了保护人身，早期的铃盖印很可能就是源于护身符之类的小东西，无论是铃盖式的还是滚筒式的，都没有摆脱护身符的意义，在他们的主人眼里都被视为神圣的财产。”^②至于古老的滚筒印面上图案流行刻有向女神们献礼的场面，从公元前2100年起，印面上的女神通常被一个神化了的国王所代替。2014年初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安纳托利亚文明”展中就有一陶罐残件（公元前15世纪），口沿部外表盖有滚筒印的戳记，解释是“左侧场景为信徒（较小的人物）正在敬奉风暴神，右侧描绘的则是赫梯国王在祭祀风暴神”（图12）；另一件青铜时代中期（公元前2000—前1750年）古亚述文碑刻（黏土，图13），内容是夫妻的婚姻契约，规定夫妻不论富有或贫穷，两人均应平等共享财产。仔细观察，此碑文的上端盖有滚筒印记，或可表示此婚约的神圣不可侵犯。《世界印》所评述的，是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古埃及以及其他近东和地中海地区被大量应用的、外形似甲虫的“圣甲虫”私印（Scarab seal），翻译时则突出一“圣”字，因为在古埃及传说中，Khepri（赫普里）是黎明旭日东升时的

① [美] 罗伯特·E.勒纳等著，王觉非等译《西方文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② Dominique Collon：前揭书，p.19。

甲虫形太阳神，同时也是司重生、新生、洗心革面而再生的神。另外，据本书第五、六篇章论述，古希腊、古罗马印的神圣性与印材有显然的一致性，如公元前7世纪，象牙印通常是敬女神之物（如斯巴达），还有专献给月亮女神阿特米丝（Artemis）的印；罗马刻在血红宝石上的凹雕，常为太阳神（Sol God）；谷物女神（Demeter）适于刻在绿色碧玉石上；等等。“在整个帝国时期，希腊罗马式的众神（如众神之神朱比特、战神玛尔斯、亡灵引导神墨丘利、医神埃斯库累普、智慧女神密涅瓦、狩猎与夜女神戴安娜、谷物女神克瑞斯、美神维纳斯），以及其他一些埃及的神祇们都是印上常见的图像。”^①而中国印的神圣性大多表现在以印章作为辟邪之吉祥物，如汉代的刚卯（图14）佩戴就十分流行，这主要与道家思想有关。后来特铸一种佩印，专用以随身“辟除不祥”。如《后汉书·舆服志》载：

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刻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央，灵受四方。……赤螭刚瘳，莫我敢当。^②

又如晋代葛洪《抱朴子·登涉篇》载：

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③



图11 护身符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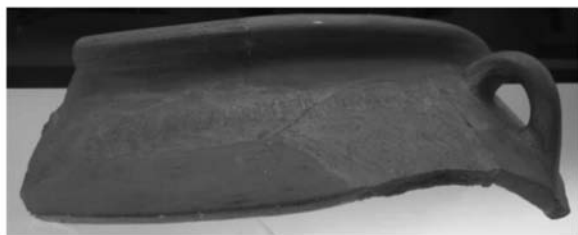


图12 “安纳托利亚文明”陶罐残件



图13 古亚述《婚姻契约》



图14 刚卯实物及其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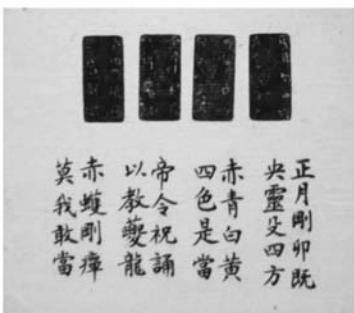


图15 黄神沙者印章

① Dominique Collon: 前揭书, p.92。

② (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673页。

③ (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第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这类印出土流传颇多，印文内容也较为丰富，如“黄神越章”、“高皇上帝之印”、“黄神沙者印章”（图15）、“黄神使者印章”、“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天帝神师”等。

正如林乾良先生描述中国印的功用所言：

在中国漫长的三千年封建社会观念中……天，似乎是一切神的总和，其首领自然就是上述印中“天帝”。这种观念，与西方社会中的“上帝”如出一辙。而各级官吏又是受命于天子，自然就间接地具有天的权威。（由此）不但印之本身有些魔力（神圣），即其印记也同样有之。因此，中国民间常有恳求地方官或宗教、神祇的一纸印记，悬于室内或门楣之上，用以驱妖避邪、祈福求祥的习惯。^①

3. 装饰性

装饰，是美的表现手段之一，简而言之，就是美化其所依附的主体事物以引人注目。装饰是人的本质所体现的一种方式，是潜意识的需要，它人类的设计活动带来了积极而丰富的表征，是一重要的历史现象，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在世界印章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一开始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下，印章的制作固然粗陋，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西方印章与首饰关系密切以后，当时的能工巧匠便想方设法对印章进行装饰，不仅以宝石诸如赤血石（Haematite）、天青石（Lapis Lazuli）、光玉髓（Carnelian）、钻石（Diamond）、紫水晶（Amethyst）、祖母绿（Emerald）、海蓝宝石（Aquamarine）等作印材镶嵌，将印体装饰得富丽华贵，而且印面的雕刻也有不少装饰图案出现。如《世界印》第三篇章描述，公元前2500年至前1900年，印度河流域为哈拉帕文化的盛期，考古发现了几千枚当时的印，其中一类为方形印，印纽隆起近乎半圆形，且中间有孔可以穿带，印面图形系当地人的图腾（马形狮尾的独角兽），其上用印度河文字标出印主的姓名等，颇具装饰性（图16）。还有米诺斯文化中期（公元前1700—前1600年）最早在印面刻制复杂精细的几何图案（图17），分析者认为它们只是早期印上经常出现的格子图案与叶形图案的混合。又如《世界印》第七篇章介绍：

在拜占庭（中国史籍中称之为“大秦”）时代（公元330—1453年），流行用字母组合图案。早期的印记，包裹于粗粗的花环中。……6世纪时，字母组合图案是紧密的，以方形字母为基础，例如P、N或H，这些被称为方块字母组合图案。后来，字母组合图案更加不受限制，被称为十字组合图案（图18）。^②

再如，中世纪时封建领主罗伯特·菲兹瓦特（Robert Fitzwalter），是参与签署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一位男爵，他的印章为银质，雕工精美，印面中间刻的是男爵本人驾骏马而御飞龙，盾牌上、马衣上同样饰以纹饰，应为图形标志；周边环境环绕着表明主人身份的英文大写字母（图19）。全印极具中世纪欧洲印的装饰代表性。况且，宝石在西方被视作天地间精华与灵气的产物，以此装饰印

^① 林乾良、孙喆：《世界印文化概说》，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② Dominique Collon：前揭书，p.108。

体,不管其种类,都能带来吉祥,如健康和长寿、荣耀和财富等。另外,西方常用的戒指印、垂饰印的佩戴(戴在手上、悬挂于颈部、坠于衣物上)本身也是一种装饰。如18世纪晚期的英国,私印被花哨地穿于丝带或分裂的圆环上而成印串,借以用来点饰服装,竟成为一种时尚。在中国,汉代“赵多”四灵印之印面文字四周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图像环绕,明显就是一种装饰手法(图20)。“四灵”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对自然的崇拜,后经长期演化,成为世间喜闻乐见的祥瑞。在汉代,四灵之图像被大量刻入印章,供人们佩带以避邪,从而形成了富有装饰意味的四灵印。还有秦汉鸟虫篆印以及宋元时期大量押印上的象征性符号等,客观上也对印面起到了一定的装饰效果(图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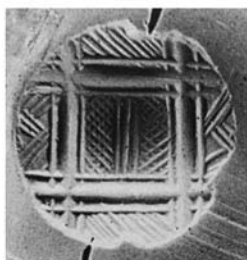


图16 印度河流域印

图17 米诺斯文化印

图18 拜占庭十字组合图案印



图19 中世纪英国男爵印

图20 汉代四灵印

图21 宋元押印

4. 艺术性

据《世界印》主编Dominique Collon研究,经考古发现,早在7200年前就有一种陶土制的印,多具柄,柄上时有穿孔以便装绳悬挂;印面有经过设计的图案,大部分为几何形,少数是山羊,极个别为人。这些印主要盖在陶器、篮子或其他容器上,应该是作为实用的标记,然而其印体造型和印面所刻都蕴含着艺术的因素,毕竟艺术起源于实用。且看林乾良先生描述的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陈列的公元前4800年至前1800年出土于伊朗、伊拉克的印,均为几何图形(图22),便可见其艺术性的视觉效果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精湛的工艺为印章刻制的艺术性带来很大的进步。从米诺斯文化中期开始,由简单的钻孔技术逐步发展到一种弧形的车床,上有两根平行的金属杆,杆的顶端有各种形状的钻孔工具。杆子上还装有大小不一的刻线的轮子及抛光工具。这就使得刻印者能够精心地从各个角度去雕刻,印的艺术性自然得到不断的新表现。如藏于雅典自然博物馆的米诺斯文化

晚期的金戒指印（图23，经鉴定为公元前1500年至前1450年时物），其椭圆形的印面上刻着宗教仪式的舞蹈场面，艺术性不同一般。据《世界印》第十一章“伊斯兰印”介绍，公元7世纪初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早期（公元8—12世纪）就有书写体印，印文有姓名或宗教用语（大英博物馆所藏伊斯兰印中，至少有6枚刻有“唯真主万能”），风格各异，有的比较简朴，有的则精雕细琢（图24）。晚期（公元12—19世纪），草写体印代替了早期的书写体印。伊朗古城大不里士（Tabriz，中国古称桃里寺）的波斯书法家于15世纪创造了一种题铭体（Nastaliq），成为16世纪之后最为流行的印文字体（相当于中国印文之“缪篆”）。如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枚印即为此类的代表作（图25），印文兼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内容是人名加短语。这些印通常为阳刻并越来越多地以之蘸墨钤于手写的文稿旁，可见其对艺术性的追求。至于中国印独立发展成为篆刻艺术（主要指印面），可以说是世界印章之艺术性中特殊的产物。“唐朝时，由于对考古和题铭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加，中国印开始吸引了文人学士阶层的关注。”^①其后宋元明文人学士不断参与，使印从生活的范畴进入艺术的领域，成为东方艺苑中引人注目的一个艺术分支。为此，《世界印》第十二章就将“中国印”列为“印史”与“篆刻史”两段。作者认为：

在明代（1368—1644），中国印已发展成为一门艺术，且被称作“书法的姐妹艺术”。^②

并且提出“中国印在明帝国范围内被几乎无差别的使用，且深深地影响了日本和朝鲜。这些印被视为艺术作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高于（本册书提到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印，尤其是在后期”^③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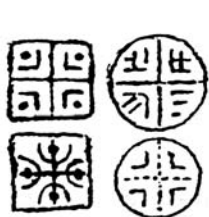


图22 几何图形印



图23 雅典金戒指印



图24 伊斯兰书写体印



图25 伊斯兰草写体印

综上所述，世界各地的印章，时代有先后，概念有区别，功能有差异，工艺有优劣，然其社会属性则大同矣（如共同的文化特质等）。中国学术界认为，那些只有复制印记功能但不具备凭信作用的印模，不属于印的范畴。而《世界印》一书所探讨的印是广义的，其中绝大多数同为“征信”之功用，但极少数印只具有某种象征或纪念意义，如古埃及新王国早期，获得金银戒指印的人，意味着他荣膺了显赫的职位或荣誉。至于有些首饰印只用于佩戴，而不一定用于钤盖印记，但在使用者或其他

① Dominique Collon: 前揭书, p.206。

② Dominique Collon: 前揭书, p.207。

③ Dominique Collon: 前揭书, p.205。

人的心目中依然是“印”的形象。因此，大英博物馆西亚部主任John Curtis在本书序言中说：

（印章）虽然发生在许多不同的文化圈和不同的时期，但是它们都是一件小的艺术品，有时甚至在形制上还非常精致。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因为含有大量艺术风格、材料文化和历史事件方面的信息和美学意义而备受青睐。^①

纵观世界印章的历史，尽管它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特征，但也都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我们不用惊讶这样的研究极具价值，但不可避免地缺少更多的维度来把它们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里。《世界印》的价值正在于“谨慎地寻找不同学科的专家来共同完成了这本书的各部分，这些专家被要求考虑用一个标准体例来写这本书，这样就能使整篇文章的内容虽跨越7000年，而涵盖各主要文明却能有统一的主题”。当然，书中还有很多图像以及精辟的描述和考证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读方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观点，从而更进一步学习、比较世界印文化之“大同异”。

（作者一系苏州大学教授、西泠印社社员，作者二系苏州大学硕士）

^① Dominique Collon: 前揭书, p. 7。